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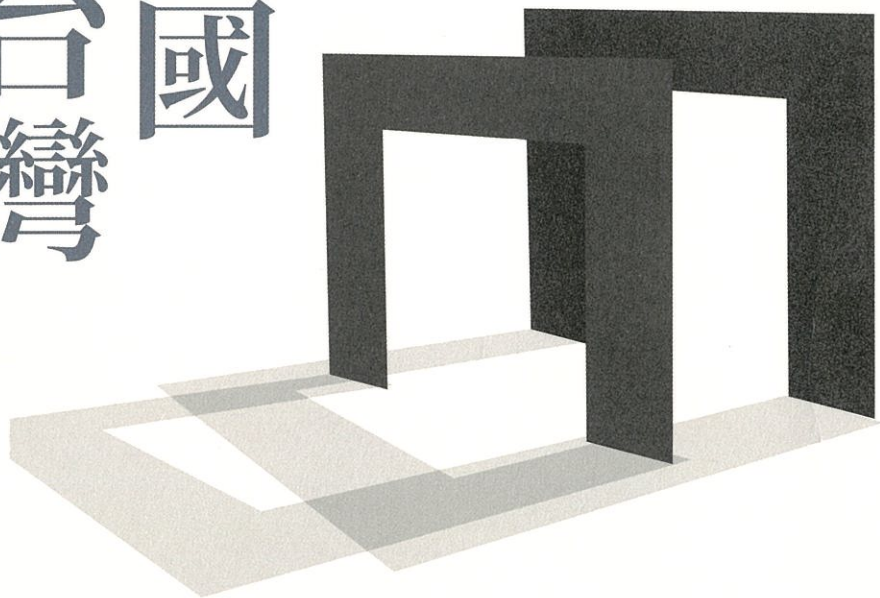
會社中心
人文研究
科學補助
出版

梅家玲

著

從少年中國 到少年台灣

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



目次

導論／「青春」的文化政治學

輯一、發現少年

從少年中國 到少年臺灣

輯二、想像中國

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
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

梅家玲 著

輯三、困頓的青春，困頓的敘事

孩童、週歲、少年？

華語敘事小說與二〇年代青春／啟蒙論述的折衷

127

75

31

5

目次

導論／「青春」的文化政治學

5

輯一、發現少年與小說教育

發現少年，想像中國

33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

小說教育

75

——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

輯二、艱難的青春，困頓的啟蒙

孩童，還是青年？

127

——葉聖陶教育小說與二〇年代青春／啟蒙論述的折變

身體政治與青春想像

——日據時期的臺灣小說

163

輯三、從中國到臺灣：孤兒？孽子？野孩子？

白先勇小說的少年論述與臺北想像

203

——從《臺北人》到《孽子》

孤兒？孽子？野孩子？

237

——戰後臺灣小說中的父子家國及其裂變

重要參考文獻

283

論文出處

295

後記

299

導論／

「青春」的文化政治學

小說青春

「青春」原指春天，因其時草木繁茂呈現青綠色，故名¹。由於它是四序紛迴之始，孕育著自然界中的無限新生契機，因此常被轉借指涉最美好、最富於新生希望的人生時光，並成為文學書寫中不斷被詠歌的對象²。

但耐人尋味的是，中華文明素有「重老輕少」的傾向。因此，儘管頌美「青春」的文學書寫所在多有，作為體現青春特質的人物主體——青少年，卻從不曾成為傳統文學中的重要角色。無論是詩詞歌賦，戲曲小說，古典文學投射的往往是父權式政教結構下的期待視野：重視文行忠信，修齊治平；強調禮教倫常，學優則仕；所形塑出的少年人物，因此多是一個個規行矩步、少年老成的「小大人」。彷彿，孩子們甫自脫離懵懂蒙昧的童騷時期，便須一步登天，躍入知禮守

分的成人世界。而他們存在的主要意義，則不外乎是要贖續家國命脈，作為既有體制及歷史文化的傳承者。

然而，從二十世紀開始，這一現象卻發生了明顯變化。緣於世變，晚清以降的知識分子屢興「救國」、「新民」之思，並藉由「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等理念，在小說中寄寓其家國憂思；所期待的，不外乎是一個能除舊布新、日益茁壯的「新中國」——而無論是文學想像抑是社會實踐，這個建構「新」中國的重責大任，正要由未受舊社會惡習污染，充滿青春理想的青少年來膺負。於是，從梁啟超倡論〈少年中國說〉，到陳獨秀〈敬告青年〉、李大釗抒論〈青春〉，以及巴金在《家》中屢屢自許自豪地宣稱「我是青年！」，莫不凸顯出：作為「民族幼苗」、「國家未來主人翁」的青少年，是如何因為內蘊著「青春」與「新生」的期盼，被賦予了空前重要性；而「青少年成長」與「國家成長」，又是如何在小說的文學想像中互為表裡，成為彼此象喻的一體兩面。

因此，本書將以二十世紀的中文小說為中心，探討其所體現出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以及相關的文化政治議題。進入正式論析之前，在此先說明從「少年中國」到「少年臺灣」之敘事話語的源起、關乎於「青春」的文化政治，以及分輯概要。

從「少年中國」到「少年臺灣」：敘事話語源起與「青春」的文化政治

作為敘事話語，「少年中國」與「少年臺灣」其實俱有所本，並且深有淵源。一九〇〇年，流亡海外的梁啟超在《清議報》上公開發表〈少年中國說〉一文，應是「少年中國」論述具體成形之始。梁的文章，不唯從多方面辨析「老大帝國」與「少年中國」的關係，更藉由多種鮮明的意象對比，熱情洋溢地標舉出其間的絕大差異，如：「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為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在在以「人之老少」喻擬「國之老少」，高度肯定「少年」的進取前瞻意義。而「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少年中國，與國無疆」³的贊辭，亦正是時人的共同願景。

此一論述的最大意義，在於它藉由「少年中國」與「老大帝國」的對比，重新「發現」了「少年」；不僅視之為挑戰傳統，頡抗老大的新興力量，並且將其與「中國」的國族想像相互勾連⁴。追本溯源，此說其實晚清早有端緒，未必肇始於梁。但在此之前，僅僅為時人朦朧的理念與憧憬，未嘗形諸具體論述⁵。經梁啟超正式倡議之後，士人們以「少年」自命並力圖惕勵自強，遂成為一時風潮。除了梁本人率先表示：「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之外，《清議報》中亦隨即出現不少以「同是少年」、「鐵血少年」、「濠鏡少

年」、「突飛少年」等為名的作者群，或抒發壯懷，或吟歌勵志。甚且連晚清四大小說家之一的吳趸人，都一度以「中國老少年」為筆名，「少年」迷魅，至此可見一斑。此時，「少年」實則是作為涵涉一切青春希望的修辭策略，而所謂的「少年中國」，正是一種重新「自我命名」的召喚行動。一九〇二年，南洋公學學生組織「少年中國之革命軍」，首倡現代中國之「學運」⁷，正可視為相應的社會實踐。

時至民國，「少年」所召喚出的激情有增無減。一九一八年，王光祈、李大釗等人在北京創辦「少年中國學會」，其規章開宗明義第一條即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為宗旨」⁸。從命名來看，當可說是「少年中國」之理想在民初的具體實踐。該會總會成立不久，南京、上海、成都、巴黎等地皆如響應，紛紛成立分會，並先後發行《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少年社會》等期刊，讀者遍及全國，盛極一時，流風之廣被，由此可見。此學會成立之初，胡適曾以〈少年中國之精神〉為題發表演說，引述荷馬詩：「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便不同了」，作為對「中國少年」的期勉¹⁰。不久後，《少年中國》特別製作兩期〈少年中國學會問題號〉，先後載有李大釗〈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王光祈的〈少年中國〉之創造、〈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畫〉、惲代英〈怎樣創造少年中國〉等專題論文，凡此，俱可視為晚清以後，「少年中國說」的再度發揚光大。

不過，正因為人人「心中自有少年中國在」¹¹，不同個人的理念懷抱，卻是將此一憧憬，

投射為不同的國族想像。「少年中國學會」成立後不久，成員間即因是否應信仰某種「主義」而屢有爭辯；在活動路線上，則先有政治活動與社會活動之爭，後來又轉變為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終至分裂瓦解，無以為繼。爾後，會中信奉社會主義的李大釗、恽代英、黃日葵等成為共產黨中堅，毛澤東更是領袖一黨，主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數十年。堅持國家主義的曾琦、李璜、陳啟天、左舜生則另創中國青年黨，堅決反共¹²。現今看來，該黨雖未能如大陸之共產黨般主導臺灣的民國政壇，「少年中國學會」也未必能被視為彼時「中國」的縮影，但由小及大，「少年中國」的文化政治與社會實踐，竟自衍生出左翼與右翼、大陸與臺灣間無數的政爭烽火與長久對峙，其滄桑始末，委實令人感慨係之¹³。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當《少年中國》行將停刊，「少年中國學會」瀕臨解散之際，一批來自臺灣的北大青年學生，卻在北京組織了一個名為「臺灣青年會」的社團，並將蔡元培、胡適之、梁啟超等人均列為「名譽會員」。該會成立於一九二二年，一九二六年在張我軍、吳敦禮、陳清棟等人倡議下重組，同年發行《少年臺灣》月刊，作為會報。《創刊號》中，張我軍即曾以不同筆名，分別撰寫〈少年臺灣之使命〉、〈少年春秋〉等文章¹⁴。在此，「中國」縱使易位為「臺灣」，「少年」卻依然與「臺灣」並置且負有重大「使命」。姑不論「中國—臺灣」文學間是否有必然的傳承關係，但視「少年」為家國的託喻，對「少年」寄予除舊布新的厚望，二者實是如出一轍。

正是這樣的語境背景，經由「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角度去探討二十世紀的中文小說，不但具有創新性¹⁵，更有其重大意義。

事實上，伴隨前述社會實踐的同時，即是大量圍繞於「青春」的各類文化政治論述與文學想像。它包括「少年」、「青春」、「青年」等話語間的錯綜遞嬗；及其與「國族」、「小說」、「教育」之間的相互糾葛。

從歷史進程看來，「少年」話語大盛於晚清，但「青年」一詞的使用，已不乏見¹⁶；五四前後，與傳統文化猶有牽繫的「少年」一詞漸漸功成身退，取而代之的，乃是新興的「青年」一詞，它並且順理成章地成為「青春」喻託的載體，以及「國家」的希望所繫。當時創刊的不少重要刊物，都由此著眼。如一九一五年九月，《青年雜誌》創刊，陳獨秀（一八八〇—一九四二）撰寫發刊詞〈敬告青年〉，開篇以「初春」、「朝日」等譬喻，彰顯「青年」的新鮮活潑，希望無窮，既承續了「少年中國」的新興氣象，也具象化了「青春」的人物實體¹⁷。之後李大釗發表〈青春〉，倡言「吾族今後之能否立足於世界，不在白首中國之苟延殘喘，而在青春中國之投胎復活」、「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資以樂其無涯之生」¹⁸；為《晨鐘報》撰寫發刊詞〈青春中華之創造〉，復提出「蓋青年者，國家之魂」，當努力為國家自重，並應「以青春中華之創造為唯一之使命」¹⁹，亦無不以「青春」與「國家」相提並論，而「青年」，正是貫串於其間的能動主體。至於其後的

「少年中國學會」，儘管會員們頻頻以「少年中國之少年」自許，但放言抒論時，「青年」已是自我指稱時的習見用語了²⁰。

另一方面，我們當然不要忘記，就在梁啟超倡言「少年中國」的同時，他還有「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以小說教小學」等相關配套的教育理念。所謂「教小學急於教大學，教愚民急於教士夫。……故吾恆言他日救天下者，其在今日十五歲之童子乎！西國教科之書最盛，而出以遊戲小說者尤夥，故日本之變法，賴俚歌與小說之力；蓋以悅童子，以導愚氓，未有善於是者也」²¹，即此之謂。其本人，更藉由譯介《十五小豪傑》、撰著《新中國未來記》等方式身體力行。循此，這就又使得「少年」、「青年」、「青春」等意象，與「小說」及「教育」之間，產生密切的內在聯繫：小說成為啟蒙青少年、振興國族的重要教育材料，青少年（身體）所蘊藏的種種「青春」的成長動能，又每每伴隨著個人的認同追尋與情慾求索，成為小說家想像家國，書之不已的內在驅力。「國體」、「身體」與「文體」，亦以此交相關涉，相互辯證，其間曲折，自是耐人尋味。

也因此，無論是從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對照下的歧異處著眼，抑是由「感時憂國」的時代氛圍，以及中國之「現代性」追求歷程角度觀照，都會發現，從一開始，二十世紀的中文小說，就已儼然成為銘刻「青春」的文化政治學——小說家們一方面意圖藉由小說（對青少年）進行「新」民、「啟蒙」，另一方面，又頻頻聚焦於青少年人物，不僅對他們的成長與幻滅，多所演義；

甚且，還以他們的愛恨悲歡，身世遭逢，見證著政爭烽火，社會遷變。國族論述與青春想像交相激盪，遂構成近現代小說中的重要主題。其間，無論「中國」抑是「臺灣」，新青年們的成長經歷容或有別，但種種追尋求索，無不糾結著對家國土地、意識形態的取捨掙扎，並且召喚著新與國體的「自我命名」行動。尤其八、九〇年代以來，臺灣政經社會的快速變化，遠甚於既往，來自世界各地的新思潮衝激不斷，特別是，同性情慾論述的介入，更促使「少年臺灣」的文學想像別開生面，不同於既往。從「少年中國」到「少年臺灣」，既蘊含時間流變中的革新實踐，也投射出空間位移後的自我定位與家國再造。所涵括的面向，既有「老少」、「新舊」、「父子」之間的多元角力與彼此辯證，也因小說、教育、出版、身體、情慾、性別等不同因素的糾結拉鋸，產生諸多變化。

有鑑於此，本書遂以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為起點，結合其自撰小說〈新中國未來記〉，討論所關涉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論題，為全書張目；繼以包天笑、葉聖陶，以及臺灣日據時期以來的重要小說為代表性個案，就「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展開系列論析。整體而言，它的目的並不在於作為完整的文學史論述，卻意圖以文學／文化史的視野，凸顯此一世紀小說書寫的內在特質與美學實踐，並開展它與啟蒙教育、出版文化、身體論述、性別研究、情慾敘事等不同論域的對話思辨。全書凡六章，循由以下三個部分，進行討論：

- 一、發現少年與小說教育；
- 二、艱難的青春，困頓的啟蒙；
- 三、從中國到臺灣：孤兒？孽子？野孩子？

發現少年與小說教育

由隱而未顯，視而不見，到被有心發現，刻意標舉，「青春」伴隨著「少年」成為近現代文學與文化想像的重要主題，並非偶然；它所關涉的，更不只是文學書寫中的修辭喻託而已。無論是什麼文化傳譯，文學想像，抑是啟蒙實踐，近現代的青春憧憬無所不在。而它的端緒，自當歸諸於梁啟超所倡議的「少年中國說」，以及相應而生的種種革新作為。

一九〇〇年，梁啟超發表〈少年中國說〉；一九〇二年，《新小說》創刊於橫濱，創刊號中，他以〈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建構以小說新民的理論，同時也刊出自己創作的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再加上前此不久，《新民叢報》刊載了梁親自譯述的法國小說《十五小豪傑》。凡此種種，無不宣告著「少年中國」的希望工程，已堂皇啟動；「少年」、「中國」、「小說」三者，正所以交相關涉、彼此定義，共同成為許多相關論題的輻輳點。

不過，既然中華文明素來重老輕少，「少年中國」的青春憧憬卻要視「少年」為過去老舊中

國的對立面，強調以初生新發之姿去反叛傳統，頡抗老大，這一觀念的突破性不言而喻。追根究柢，它是從何而來？如何後續發展？其「理念」（少年中國的論述）與「實踐」（小說書寫或政治作為）之間，具有怎樣的對話關係？再者，此一希望工程，固然發軔於「發現少年」，但「小說教育」，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核心。雖然早在〈少年中國說〉之前，梁啟超已在〈蒙學報與演義報合敘〉中鼓吹要以小說「悅童子」、「導愚氓」²²；倡言「政治小說」之重要性時，也不忘強調它與「少年教育」的關係²³。然而，一旦要落實為具體的教育實踐，卻涉及了許多複雜的問題，諸如：什麼樣的小說，才是最適合用以進行少年教育的小說？這些小說的來源如何？依違於傳統與現代、啟蒙教育與商業出版之間，此類小說又將如何在當時的文化場域中自我定位？

凡此，都是研探二十世紀小說之「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時，首先必須回應的問題。也因此，本書首輯遂以「梁啟超」與「包天笑」為代表性個案，就二十世紀之初，「發現少年」與「小說教育」的相關論題進行探討。〈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以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為起點，擴及其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和同一時期的其他相關論述，辨析「少年中國」與「老大帝國」間的牽纏糾葛；再以〈新中國未來記〉與〈少年中國說〉互參，探析此一論述本身內蘊的矛盾與駁雜性格，及後續影響。文中指出：原來，萌興於晚清的「青春／少年」想像，以及「以少代老」的突破性觀念，實源於梁啟超對日本學者志賀重昂及德富蘇峰「新日本少年說」的轉介²⁴；而梁啟超力圖以小說啟蒙少年中

國，新國新民，意義所以殊異於過往，並不僅因為改造了「文以載道」的傳統，將原先用以載道的經史文章置換為小說而已；而是將所載之「道」的重點，由原先的義理倫常教化，轉移為對新興國族的憧憬想像，使小說成為串接「少年—啟蒙—新中國」之間的重要鏈鎖。〈新中國未來記〉之前，梁曾譯著法國小說《十五小豪傑》，該書從書名更易到〈後記〉說明，莫不透露出此一訊息²⁵。而〈新〉文本身在憧憬少年、期許未來的同時，卻也不斷地提示我們：不僅在啟蒙實踐上，老少新舊原難以斷然二分；即或是國族想像，「中國」的主體性，同樣因中西文化的交媾混血，而曖昧不明。

另一方面，來自於日本方面的「文化傳譯」，不僅深自影響了晚清「青春／少年」想像的生成，相偕而來的「小說教育」，更不例外。只是，儘管梁啟超鼓吹小說教育不遺餘力，真正的實踐，卻有待於包天笑大量譯著教育小說，作為少年讀物。

從早先的《兒童修身之感情》²⁶，到後來得到大獎，風行不輟的「三記」²⁷，包天笑在清末民初小說教育方面的貢獻有目共睹。由於包原為舊派文人，因此，當他因從事種種新文化的譯著事業，轉變為「新型文化人」，並因緣際會，落實梁啟超「小說教育」的理念時，所體現出的，遂不只是單純的「以小說教小學」而已。經由〈小說教育：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小說教育〉，本書首先釐清了「少年」與「教育」及「小說」三者間的錯綜糾葛，繼而指出：源自於歐西的「教育小說」，原是最適於作為少年教育的小說體類。它的敘事重在體現少年的奮鬥成長及學校教育

生活，恰恰與當時憧憬青春，強調教育啟蒙的社會現實相呼應，且為青少年的學習成長，提供具體的參考範式。然而，在引進西方「教育小說」的同時，晚清文人原也不乏著眼於教育問題，投射種種「教育想像」的小說書寫。二者之間，原頗多對話空間。更何況，以包天笑為例，他在譯介歐西小說多年之後，反而以「回頭看」的姿態，藉由傳統白話章回小說形式，創作自傳式的教育小說《青燈回味錄》，並以調侃方式有意將「小說」與「遊戲」相提並論²⁸，箇中消息，即深堪玩味。從晚清小說家自撰的白話「教育」小說，到以文言引介翻譯國外「教育小說」，所涉及的，不僅是中西新舊文白等問題的糾結互動，也是時空論述與青春想像的翻新，是文學傳統與現代性的往來交鋒。包天笑及其於教育小說的譯述進程，正所以促使我們注意：晚清以降，「啟蒙論述」在現代性追求過程中，因「文化生產工業」所造成的種種變化；以及，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之外，以包為代表的「通俗文人」在近現代文學發展史上（向來被忽略）的意義。

艱難的青春，困頓的啟蒙

如前所述，五四前後，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少年」一詞已被新興的「青年」一詞取代。而所謂的「新青年」，更以其「在大學時期身受新教育具新知識」，成就了自我的特殊身分，不僅成為傳統文化的對立面，並且被認為具有教育社會，啟蒙大眾的能力與責任²⁸——只

是，千呼萬喚，那凝聚了無數青春憧憬的新國家，是否真能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展而隱然在望？事實上，由於乙未割臺，五四之後，中國與臺灣，無論在政治社會、文學文化方面，都發展各異；其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亦因此殊軌分流。而無獨有偶的是，無論中國抑是臺灣，小說中所投射出的，竟然都是青春的艱難，啟蒙的困頓。

中國方面，五四新青年們的激情理想，志業抱負，撼動了無數人心；「青年社會」遂自然取代「少年中國」，成為彼一時代有志者共同的希望所繫。然而，儘管三千學生的遊行活動轟轟烈烈，震驚中外，後續發展，卻未必與原先的期盼桴鼓相應。以二〇年代著名教育小說《倪煥之》為例，主角人物倪煥之，原為對教育事業充滿熱情的新青年，卻在遭遇連番挫折之後，英年猝逝。「青春」不再，「啟蒙」失敗，所投射出的，豈只是來自學生、家庭、社會的諸般現實困境而已？「孩童」、「少年」、「青年」三者因分化而產生的緊張關係；「啟蒙」的急迫性和「教育」所必需的「日常時間性」之間的矛盾齟齬，恐怕才是真正關鍵。

於是，經由〈孩童，還是青年？——葉聖陶的教育小說與二〇年代青春／啟蒙論述的折變〉，本書梳理了來自社會現實、敘事話語與「青年」、「孩童」等文化符號的錯綜糾結及多方對話。指出：「青春」之所以成為晚清以來最有力的激情符號，正是因為它以進化論為基礎，在線性時間軸上許諾了一個具有無限可能性的未來；這個未來，必須憑藉「新生」的憧憬，不斷建構與重構。由晚清所「發現」的「少年」，不僅實指現實人生中最富活潑朝氣的特定階段，更

是涵涉一切青春希望的修辭策略。也因此，繼「少年」之後，亦有「孩童」、「青年」的相繼發現（或創造），共同成為當時中國「青春想像」的人格化表達，並喻載著整個社會除舊布新、經歷巨大轉型時的政治與文化能量。然而，弔詭的是，一旦「青春」由想像面落實為現實人生階段，遂形成了內部分化的難題：「孩童」是為人生之蒙昧期，也是需要被啟蒙、被拯救的對象；「少年」是具有能動驅力的成長階段，「青年」則以其所具備的新知識新教育，被賦予了「啟蒙」大眾的重責大任。由「孩童」成長到「青年」，需要的無非是日常時間的積累。五四以後，青年們汲汲於啟蒙大業，有待時間養成的「孩童」，卻跟不上啟蒙救亡急迫的腳步。如此一來，儘管同樣肩負了打造新國家的殷切期盼，「青年」遇上「孩童」，反而憑添無限矛盾困頓。作為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的第一部長篇教育小說，《倪煥之》所敘述的，竟然是教育的不易為，不可為。以「教育」為目的，導致的是「反教育」的結果；憧憬青春，面臨的卻是青春的艱難與幻滅，這真不能不說是一大反諷了。

而與此同時，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新文學，又是如何呢？

整體而言，從清領到日據，臺灣所歷經的，除卻政治社會層面的巨大衝擊外，更有空間、文化等多方面的改變。也因此，相對於五四以來，中國現代小說關注於「新青年」的「啟蒙」、「教育」與「革命」等議題，臺灣小說，卻是藉由殖民地青年往來於不同空間的認同追尋，以及自我身體的或病弱、或強健，「體」現出此一特殊歷史情境中的各種社會文化與政治軛轡。〈身

體政治與青春想像：日據時期的臺灣小說》正是由此著眼，探討其間「身體與空間／認同政治」及「從臺灣身體到皇民身體」兩大主題。

從臺灣新文學史上最早的白話小說之一——追風（謝春木）的〈她要往何處去〉開始，我們就不斷看到許多臺灣青少年在這些不同空間中游移往來的身影：日本，還是臺灣？都會，還是鄉村？異鄉，還是故鄉？舊書房，還是新學校？無論是奔赴，是留駐，抑是離去，不同時期、不同空間的身體位移，喻託的不僅是擺盪在殖民化與現代化歷程中的認同轉折，更有戀愛追求、改革實踐，以及各種意識形態的交相作用。這特有的駁雜性，更提醒我們進一思辨：身體的歸趨，是否就是精神意向的完全投射？從歷時性角度觀照，不同時期的身體位移，是否也將隨著外在政治現實的改變，宣示著認同的流轉或質變？無論是追風還是龍瑛宗，是巫永福、周金波還是呂赫若，檢視臺灣新文學發展的歷程，這些由文學想像所投射出的青春身體，不僅要以己身於不同空間中的往來趨避，標舉認同的游移或質變，其本身身體或生理現象的強弱變化，同樣糾結著駁雜的政治意涵。

各式各樣的病體充斥，是為早期臺灣小說顯見的特色；更令人驚心的是，除卻本來就屬於弱勢者的婦女與孩童之外，作為社會中堅的青年們，同樣要以身體的病弱衰敝，折射出此一特殊歷史時期中的臺灣處境。它由賴和的〈一桿稱仔〉首發其端，其後張文環〈閩雞〉、浪石生〈面頰〉、王詩琅〈青春〉、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等，一連串小說中的青年男女們，或過勞

致病，或備受殖民勢力欺壓傷身，或藉由結核病體，寄託殖民社會中的理想追求與挫敗，這些人物身世不一，遭逢各異，然而意識形態、文化政治與社會現實的往來交鋒痕跡，卻都在各人的病體上歷歷可見。

不僅於此，由病弱而強健，乃是臺灣子民共同的想望，然而，作為殖民地時期小說中的青春身體，其強健的結果，竟未必是臺灣主體的重建，反而可能是從「臺灣身體」到「皇民身體」的質變。周金波的系列小說，主角人物勤於鍛鍊體魄，身強體健，他們之所以一改過去病弱衰敝之態，目的竟然是要成為效命天皇的「志願兵」，不僅要為日本勇赴征場，甚且，還要以一己的粉「身」碎骨，為國捐「軀」，為得來不易的「皇民」身分背書³⁰。只是，此一執意於「捐軀」的年輕身體，除了輾轉於日本／臺灣之間外，還有沒有其他可能的歸屬？在此，張文環的書寫卻意外地開啟了另一面向。

志願兵制度實施後，張文環曾有不少相關言論發表。有趣的是，他的重點多集中在志願兵將如何能使臺灣青年成爲一個完整的「男人」³¹。而一旦由「性別」視角展開觀照，身體的象徵意義遂更形曖昧：它既非「臺灣身體」，也非「皇民身體」，而是雄糾氣昂的「男性身體」。這似乎意味國族認同之外的另一出路，並暗示了其人不同的政治立場。此一對身為「臺灣男性」的刻意強調，未嘗不可視為因為身受日本殖民「去勢」之後，意欲重振「雄」風的隱喻。其間曲折，不只引人深思，甚且，也成爲觀照戰後臺灣之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的重要門徑之一。

不只引人深思，甚且，也成為觀照戰後臺灣之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的重要門徑之一。

從中國到臺灣：孤兒？孽子？野孩子？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一九四九年，國府遷臺。隨之而來的半世紀家國動盪，政經變革，無可避免地左右了文學想像的走向。其間，國族認同的依違徬徨，自然是重要關目。明顯可見的是，從吳濁流的經典之作《亞細亞的孤兒》開始，「父子」關係便每每成為戰後臺灣小說思辨家國鄉土的重要喻託。所以如此，自當是緣於華人文化中，向來有「以家喻國」的傳統，習於以家族中的父子血緣傳承為基礎，延展出崇尚完整一統而又位階井然的社會國家想像。所謂「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³²，不僅是古有明訓，而且深入人心。

在此背景下，日子正當青春的「子輩」們，遂每每要以其與「父輩」們生理血緣之斷續，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衝突或和解，在小說中演義家國想像的幽微心事。戰後以來，臺灣重量級的小說如王文興《家變》、白先勇《孽子》等，書名本身，就都已不約而同地透顯出箇中消息，比合而觀，更可見彼此間微妙的對話關係。本輯〈白先勇小說的少年論述與臺北想像——從《臺北人》到《孽子》〉，以及〈孤兒？孽子？野孩子？——戰後臺灣小說中的父子家國及其裂變〉，即著眼於此，並試圖由「性別」視角切入，觀照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的往來交鋒。所關切的論題，主

要集中於因遷臺之空間位移而生的地域認同取捨，以及對於以血緣傳承為依歸的傳統文化政治的反省思辨。

《臺北人》與《孽子》不僅俱為白先勇的代表作，也是戰後臺灣小說備受重視的名篇。由於主題不同，長短有別³³，過去學者從不曾將它們並置討論。〈白先勇小說的少年論述與臺北想像——從《臺北人》到《孽子》〉一文則率先將它們視為具有內在淵源的小說文本，並且指出：「（同性戀）少年」的青春想像與「（臺灣）臺北」的地域認同乃是白先勇小說中一貫的關懷重點。將《臺北人》與《孽子》對照閱讀，正所以促使我們思索：「徬徨街頭，無所歸依的孩子們」，是否必要，或該當如何，去面對屬於父母輩的「憂患重重的時代」？如果說，「同志／酷兒論述」是對傳統「家國」大敘述的一種反叛與頡抗³⁴，那麼，少年孽子們是否重新定義了白先勇的家國關懷？而「臺北」，又是以何種姿態，介入其間的折變？

誠然，屬於「先父母以及那一個憂患重重的時代」的《臺北人》，無論是「臺北」，抑是「人」，都不免「於在場處缺席」；然而，《孽子》中「那一群在最深深的黑夜裡，獨自徬徨街頭，無所歸依的孩子們」，卻是以富於青春活力的「新臺北人」姿態，改寫了「臺北」與「人」的想像關係。經由「臺北新少年：孽子們的身家譜系與情慾敘事模式」與「少年新臺北：流離動線中的臺北圖景、家國想像與父子關係」的多層次論證，我們看到的是：原先備受上一代《臺北人》鄙薄的、具有臺灣節候及地理特色的颱風地震，已內化在島上下一代《孽子》的血液之中，

成為本土少年青春生命的內在驅力³⁵。而饒有興味的是，儘管「性別論述」每每對於家國大敘述產生挑釁顛覆的作用，但此一由大陸轉向臺灣，成就「少年／臺北」之「新興個人／家國主體的想像」的主導力量，卻是恰恰來自於同性戀情慾（敘事）模式與家國論述的辯證交融：超越了唯血緣是尚的線性傳承關係，經由尋求「替代性複本」之情慾敘事策略的反覆運用，《孽子》中的臺北少年們將情慾／認同的對象，投射至多具大陸背景的父執輩；而老一輩人物，雖仍維持戀子戀童的情慾模式，但慾求的對象，實由大陸少年轉向為臺灣少年，箇中意蘊，不言可喻。

進而言之，放眼戰後臺灣小說，著墨於「父子」關係者，原就比比皆是。「性別」與「家國」論述的往來交鋒，更是其來有自，源遠流長。以是，繼《臺北人》與《孽子》的論析之後，〈孤兒？孽子？野孩子？——戰後臺灣小說中的父子家國及其裂變〉一文，即是將《亞細亞的孤兒》、《家變》、《孽子》與張大春《野孩子》、吳繼文《天河撩亂》等四〇至九〇年代的相關臺灣小說，置於「父子家國」的論述脈絡中，一併進行歷時性考察，意圖進一步詰問：不同時期的「父子」及「家國」，是如何相互定義並辯證彼此間的關係？作為見證、參與歷史社會急遽變動進程的重要象徵活動，小說如何藉由特定的青春想像與美學實踐，體現其間的游移與裂變？

在此，「家」的隱喻無疑是箇中關鍵。無論是成家、離家、返家的空間游移，抑是家人之間的親疏遠近，離合愛憎，投射出的，每每是糾結著從血緣傳承到政治文化認同的複雜情結。明顯可見的是，四〇年代中，吳濁流曾以《亞細亞的孤兒》一書，寫盡日據時期臺灣人民在認同上無

家無父的悲哀，為臺灣文學樹立「孤兒意識」的里程碑³⁶；六〇至八〇年代，孤兒退位，逆子孽子現身，先後問世的王文興《家變》與白先勇《孽子》，卻各自在有家有父的同時，演義出「逐父」與「為父所逐」的相互對話。然而曾幾何時，兒子們卻不再以家／父為念，或浪蕩街頭，或混跡黑幫，九〇年代以降，包括「大頭春」在內的各路「野孩子」紛至沓來，亦成為世紀末臺灣小說中的另一奇觀³⁷。從「孤兒」的無家、「孽子」的尋家，到「野孩子」的有家卻要棄家，從渴盼整全一統到自我崩解離散，「少年臺灣」的青春想像，遂隨著「子輩」們的徬徨追尋，一路見證了半世紀家國社會的動盪遷變，並為臺灣小說寫下殊異而曲折的一頁。

註釋

- 1 此一用法在古典文學中早已習見不鮮。如屈原《楚辭·大招》，即有「青春受謝，白日昭只」之語；其後如《文選》江淹雜體詩〈謝法曹〉：「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皋」，也作此解。
- 2 如杜甫詩：「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回：「青春作賦，皓首窮經」。
- 3 俱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清議報》第三十五冊（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一日，一九〇〇年）。（按：《清議報》每刊皆稱「冊」而不稱「期」或「號」。）又見《飲冰室文集》第二冊（臺北：中華書局，一九六〇），「文集之五」，頁七一—一二。

- 4 在過去的文化文學中，原不乏謳歌青春年少的〈少年行〉、〈少年遊〉等詩作，及肯定少年豪俠的《小五義》等章回小說，然而其中「少年」作為，即使偶有與傳統社會家國扞格處，其終極指向，仍是要回歸並效命於既有之政治文化體制，成為體制的承繼者。而「少年中國」之說，卻是在肯定少年原先即具有的「青春」、「進取」、「希望」等意義的同時，更視其為體現「現代性」的表徵，對他投射了大量「革新」、「進步」、「光明的開端」等關乎「新國家」的憧憬想像。透過此一想像，少年作為過去傳統老舊中國的對立面，不僅理直氣壯，順理成章，甚至於，還應當以初生新發之姿，捨老舊中國而另締新猷，其絕決斷裂處，顯然可見。詳參本書第一章〈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
- 5 〈少年中國說〉一文中，梁啟超曾明言：「龔自珍氏之集有詩一章，題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嘗愛讀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這似乎意味了至少在梁之前，龔氏已先一步對少年精神做出肯定，並成為「少年中國說」的想像源頭之一。此外，梁在其他論述中，還不時使用「少年德意志」、「少年義大利」、「少年瑪志尼」等詞語。此一將「少年」冠於特定國名或人名之上，藉以肯定少年精神及新興國族的作法，普遍見於晚清報刊，亦顯示出它與西方政治文化思想間的淵源。
- 6 如《清議報》四十四冊刊有「鐵血少年」之〈壯志〉，八十九冊有「突飛少年」之〈勵志歌十首〉。三十九冊刊有「同是少年」之〈寄少年中國之少年〉。餘以「少年」為名者，分見五十七、八十六、八十八等冊。
- 7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革》（上海：學林，一九九五），頁七四—七六。
- 8 見《少年中國》第一卷一期。
- 9 據編輯左舜生回憶：該刊的「銷路不壞，平常每期銷六七千冊，出過兩期婦女問題專號，都超過一萬。」見《左舜生回憶錄》（臺北：文海，一九七八），頁二二。

- 10 原載《少年中國》第一卷第一期，後收入《胡適選集》（臺北：文星，一九六六），頁一五一—二〇。
- 11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語。
- 12 詳參郭正昭、林瑞明，《王光祈的一生與少年中國學會》（臺北：環宇，一九七四），頁一九—一四七。
- 13 有關少年中國學會，及《少年中國》期刊的研究，可參見吳小龍，《少年中國學會研究》（上海：三聯書店，二〇〇六）、李永春，《少年中國與五四時期社會思潮》（湖南：湖南人民，二〇〇五）、陳正茂，《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少年中國學會」史》（臺北：秀威資訊，二〇一〇）等。
- 14 見秦賢次，〈張我軍及同時代的北京臺灣留學生〉，收入彭小妍編，《漂泊與鄉土——張我軍逝世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文建會，一九九六），頁五七—八一。
- 15 前此，儘管自梁啟超以迄於臺灣小說的相關研究已為數頗豐，然由「少年中國說」出發，進而開展出以「少年」、「青春」為聚焦點，並兼及於國族想像的文學／文化研究，實未得見。本書各篇論文先後發表後，引起海內外學界相當程度關注，不少後續研究，都循此脈絡進行。諸如：陳思和，〈從「少年情懷」到「中年危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視角〉；石曉楓，〈八、九〇年代兩岸小說中的少年家變〉（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二〇〇三）；宋明煒，*Long Live Youth: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Chinese Bildungsroman, 1900-1958*（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論文，二〇〇五）；關詩珮，〈《哈葛德少男文學（boy literature）與林紓少年文學（juvenile literature）：殖民主義與晚清中國國族觀念的建立》〉，載王宏志主編，《翻譯史研究》第一輯（上海：復旦大學，二〇一一），頁一三八—一六九。另外，二〇〇九年《三聯生活週刊》推出〈百年中國讀本重新解讀中國〉專號，開篇第一號讀本，即是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所闡示的重點，亦即為其「發現少年」的部分，以及它與其後「青年／青春想像」的淵源。

闡示的重點，亦即為其「發現少年」的部分，以及它與其後「青年／青春想像」的淵源。

- 16 如一九〇二年，梁在橫濱創刊《新小說》，之前便揭其宗旨為「專在借小說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其愛國精神」，尤其希望「新世界之青年，亦在所不棄歟」。見梁啟超，〈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新民叢報》第一四號（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一九〇二年），拉頁廣告。又見夏曉虹編，《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冊（北京：北京大學，二〇〇五），頁二一。
- 17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于硯，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人身邊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邊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青年雜誌》一卷一號，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又見《獨秀文存》卷一。）
- 18 《新青年》二卷一號，一九一六年九月一日。
- 19 《晨鐘報》創刊號，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
- 20 如宗之槐，〈致編輯諸君〉：「先要自己可以作青年的模範，具科學研究的眼光，抱真誠高潔的心胸，懷獨立不屈的意志，然後做出鼓吹的文學，才可以感動人。」（《少年中國》第一卷第三期，頁五六。）
- 21 梁啟超，〈蒙學報演義報告敘〉，《飲冰室文集》之二，頁五六。
- 22 見前引〈蒙學報演義報告敘〉，《飲冰室文集》之二。
- 23 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彼中綴學之子，覺塾之暇，手之口之，……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清議報》第一冊，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 24 志賀重昂〈日本少年歌〉的「新日本來兮舊日本去，少年起兮老人遜」（見一九〇二年《新民叢報》第二

號，頁一〇一—一〇五）；德富蘇峰為《國民之友》而作的發刊詞〈嗟乎！《國民之友》誕生矣〉：「所謂破壞的時代漸去，建設的時代將來；東洋的現象漸去，泰西的現象將來；舊日本之故老乘去日之車漸退出舞臺，新日本之青年駕來日之馬漸進入舞臺」（見東京改造社主編《現代日本文學全集》第四編《德富蘇峰集》，東京：改造社，一九三〇，頁四六），應該都可視為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先導。

- 25 《十五小豪傑》原名《兩年間學校暑假》，日譯本作《十五少年》；〈後記〉作者署名「披髮生」，文中明言：「各國莫不有了這本《十五小豪傑》的譯本。只是東洋有一老大帝國，從來還沒有把他那本書譯出來。後來到《新民叢報》發刊，社主見這本書可以開發本國學生的志趣智識，因此也就把他從頭譯出，這就是《十五小豪傑》這部書流入中國的因果了。」（一九〇二年《新民叢報》第二四號，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五日）

26 原名《三千里尋親記》，為一意大利童子的尋母故事，一九〇五年由上海文明書局印行出版。

27 即《警兒就學記》（一九〇九，後來由夏丏尊重譯為《愛的教育》）、《埋石棄石記》（一九一一）、《苦兒流浪記》（一九二二），皆曾榮獲國民政府教育部頒發獎狀表揚；《警兒就學記》在短短數年間發行十數萬冊，其中的〈掃墓〉一節，更被選入民初「商務版」高小國文課本，作為教材。

28 在「放足樂舊情懷癡叔，解頤談平話娛嘉賓」一回中，包天笑藉著為老祖母祝壽的場合，讓「眾人湊公份，招了兩班遊戲的東西，一是說書，一是變戲法」，並讓說書人道出：「諸位到了今天，都知道這兩種（按，即說書與變戲法）是在社會教育範圍以內，現在對於通俗教育有極大的功效。」（《青燈回味錄》，《教育雜誌》，八卷六期）。

29 錢穆，《中國文學論叢》（北京：三聯書店，二〇〇二），頁二六。

30 當時「志願兵」的篩選標準嚴格，競爭者眾，最激烈的時候，錄取率甚至不到六分之一。強健的體魄，自是不可或缺。而志願兵之所以讓全臺青年風起雲湧，生死以之，除了殖民政府以「島民最高榮譽」鼓舞人心、發動青年團動員青年男女加入、製造青年同儕間的相互鼓盪，以及利用青年人的民族競爭心理，讓他們藉此證明自己比日本人還要優秀等因素外，至少還有兩方面的原因：一，它使得全臺青年得以在一個特定的共同目標下不分彼此，緊密結合，成就一體感；二，它給予臺灣青年莫大的希望和指引，讓男性藉由從軍而成為完整的人，經由從軍或戰死，殖民地青年污濁、卑下的精神才得以淨化；若能為國殞落進入英靈合祠的靖國神社，更可達內臺一體之境地。參見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海行兮的時代》，頁七〇—七二；柳書琴，〈殖民地文化運動與皇民化：論張文環的文化觀〉，收入江自得編，《殖民地經驗與臺灣文學》（臺北：遠流，二〇〇〇），頁一—四三。

31 如張文環在〈一群鴿子〉中即表示：「志願兵制度的文告發表出現在報紙的時候，或許本島青年大都會覺得終於確立了做為男性應有的面目吧！」〈燃燒的力量〉也說：「男人的一生，不知道是為什麼，只想為國家獻身做事，才是男人應走的路。」分別收錄於《張文環全集：隨筆集（一）》（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二〇〇三），頁一〇二—一〇五；頁一七三—一八三。

32 《易》〈序卦〉，《周易注疏》卷九。

33 《臺北人》以十四個短篇結集，主角是各色出身於中國大陸，卻不得不隨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的人物，藉由他們在臺北的落魄流離，撫今追昔，銘記著一個已經逝去的、「憂患重重的時代」。所體現者，自是五四以來，正統的感時憂國情懷。《孽子》為白先勇小說中的唯一長篇，以大臺北一群同性戀青少年為主角，重點在凸顯他們的愛慾悲歡，徬徨掙扎，以及輾轉於放逐追尋回歸歷程中的種種心路轉折，它關懷的是「那一群

在最深深的黑夜裡，獨自徬徨街頭，無所歸依的孩子們」。

34 相關論述，可參考張小虹，〈不肖文學妖孽史——以《孽子》為例〉，收入陳義芝編，《臺灣現代小說史綜

論》（臺北：聯經，一九九八），頁一六五—二〇二；朱偉誠，〈白先勇同志的〉女人、怪胎、國族：一個家庭羅曼史的連接〉，《中外文學》二十六卷十二期，頁四七—六六。

35 如《花橋榮記》中的老板娘一提到臺北，鄙薄之情便溢於言表：「講句老實話，不是我護衛我們桂林人，我們桂林那個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我們那裡，到處青的山，綠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膚也洗的白了。幾時見過臺北這種地方？今年颱風，明年地震，任你是個大美人胎子，也經不起這些風雨的折磨哪！」（《臺北人》，臺北：晨星，頁一八四）而《孽子》中愛戀青春少年之野勁的郭老，卻視之為「孽子」們的生命特質：「阿青，你也要開始飛了。這是你們血裡頭帶來的，你們這群在這個島上生長的野娃娃，你們的血裡頭就帶著這股野勁兒，就好像這個島上的颱風地震一般」。而阿鳳遇到傅老爺子時，同樣引述郭老的話說：「我們血裡就帶著野性，就好像這個島上的颱風地震一般，一發不可收拾」。（《孽子》，臺北：遠景，頁八五、頁三一六）。

36 按：《亞細亞的孤兒》雖成書於戰前，但正式發表，卻在戰後。再者，該書原名《胡志明》；《亞細亞的孤兒》之書名，亦是首見於一九五六年所發行的日文版（日本一二三書房印行）。故論者咸以之為體現戰後臺灣小說中「孤兒意識」的重要代表作。

37 代表性文本如李順興，《廢五金少年的偉大夢想》（臺北：聯經，一九九二）、張大春，《野孩子》（臺北：聯合文學，一九九六）。